

日本研究论集

2005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研究论集

2005

(总第10集)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研究论集. 2005/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 一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9

ISBN 7-201-05098-2

I. 日… II. 南… III. 日本—研究—文集
IV. 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33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2 插页

字数:370 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30.00 元

目 录

新型中日关系的构筑与思考	杨栋梁(1)
读日本《应与美中两国合作》一文有感	米庆余(9)
自由主义史观及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	孙 政(16)
试论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战略	连会新(29)
冲绳归还交涉中的日本对美外交	田庆立(42)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对东盟的外交政策	乔林生(54)
1917—1945 年的日苏渔业纠纷	李 凡(66)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的演变	潘德昌(81)
冷战后日本政治思潮研究概述	陈秀武(93)
日本经济的结构困难	
——景气为什么不能恢复?	伊藤 诚(101)
中日经济兴衰财政政策成因论	张 光(116)
近年来日本的双边经济合作政策	石其宝(131)
丰田生产方式源流考	张玉来(145)
大阪世博会对策、成果与影响分析	陈友华(158)
金融自由化下日本农协金融的改革动向	郑 蔚(174)

- 阴阳五行思想与日本古代王权意识的形成 管 宁(183)
- 日本宗教文化的源流 李小白(201)
- 论明朝人对日本的认知 李小林(212)
- 江户时代的对外语言交流与文化 冈田袈裟男(226)
-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报界 孙继强(241)
- 荒尾精的在华情报活动 周德喜(255)
- 论东蒙各盟旗加入“满洲国”问题 王 旭(267)
- 《万国史记》传入中国考 周建高(278)
-
- 日本武家家训概观 许译兮(290)
- 试论日本女训中的儒家女性观 王慧荣(306)
- 樱花的符号意义探析 谭建川(320)
- 简论日本人的“各得其所”
——身份等级社会浅探 刘文雄(333)
- 日本开展终身教育的过程及其原因分析
..... 崔世广 张洪霞(344)
- 田中真纪子被解职及其原因分析 董 瑜(358)
- 近代日本“美术”概念形成之考证 彭修银(370)
- 日本人物画的历史素描
——从飞鸟时代到镰仓时代
..... 罗智慧 风卷孝男(383)
- 北滨之夏:函馆时代石川啄木的生活与文学 任钧华(397)
-
- “东亚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石艳春(412)
- “和敬清寂”和《茶之心》 刘德有(419)
- 从茶道看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 李 卓(431)

两度瀛山采药归

- 20 世纪初头严修考察日本教育述略 … 武安隆(441)
- 南开求学和留日时期的周恩来与日本 …… 刘 焱(467)
- 南开与爱大的“中国现地教学” …… 王文俊(483)
- 漫画作品的复制权、改编权的侵害 …… 三村量一(494)

新型中日关系的构筑与思考

杨栋梁

一、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日关系

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日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2004 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达 1678 亿美元，如果加上香港特区，则已超过 2100 亿美元，日本的对华实际投资也已超过 600 亿美元，为最大的外商投资国之一；民间交流日趋活跃，海关统计数字表明，两国互访人数四年来增长一倍，2004 年突破 400 万人次；中日地方政府间的交流合作继续发展，两国缔结的友好城市已达 309 对；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中日两国也保持着接触和一定程度的合作。这些积极因素成了中日关系乐观论者引以为证的材料。

另一方面，笼罩着中日关系的阴云正在不断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做法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两国首脑互访因此中断了三年多；日本文部科学省一再批准篡改历史教科书，激起我国民众的极大愤慨；日本修改防卫指针并将其防卫范围扩大到台湾海峡的军事动向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及东海划界的争端骤然升温；沈阳领事馆事件、珠海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福冈中

国留学生杀人事件、西安学生抗议事件、亚洲杯中国球迷闹事事件以及最近国内针对日本的示威等偶发事件不断。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日摩擦的领域和频度已超过两国复交以来任何一个时期，而两国民众的互信程度已降至最低点，最近由两国分别进行的舆情调查结果是，对对方“无亲近感”的回答均超过 50%。更值得忧虑的是，迄今为止，双方似乎还未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然而，无论是乐观论还是悲观论，都缺乏对事物的整体观察而失之于偏颇。过度的乐观论者低估了消极因素正在急剧蔓延的趋势及其对两国关系基础的腐蚀作用，低估了消极因素的发展完全可能因“政冷”而导致“经冷”并进而导致两国关系全面倒退的危险。过度的悲观论者则因过分地强调消极面而低估来之不易的巨大合作成果，因而可能会掉进“无为化”的陷阱，客观上还可能起到一种“狼来了”的暗示效果。

现实的中日关系喜忧并存且充满变数，可以说正站在一个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对此，我们既不应大意，也不应惊慌，而应冷静、理性地分析制约两国关系的各种因素，从我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出发，重新调整并构筑新型的中日关系。

二、日本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及其政策指向

为何近年来中日摩擦增多，其原因的解明无疑是构建新型中日关系的前提。从大的视野来说，这应该在日本、中国和世界这三个维度中探询，因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日本而言，以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为契

机，开始了近代以来第四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与学界通行的说法不同，笔者认为，除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之外，日本还发生过战时天皇法西斯体制的“变革”，但这一“开倒车”的变革是以失败告终）。我们不仅看到这次变革使战后以来日本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动，而且也注意到其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对外政策的调整，这些变化或许正是解读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之所以我行我素的一部词典。

这里的“新国家主义”概念是相对于日本战前、战后所奉行的“主义”使用的。战前日本曾在“大和民族优越论”的口号下，推行极端国家主义，企图独霸东亚，充当“东洋的盟主”。战后，日本通过民主改革，接受了和平、民主发展的方针，基本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则在于文化本位主义及政治大国化的诉求。这一思潮在战后强大的民主主义潮流下曾长期蛰伏，但并未销声匿迹。从岸信介时代的暗流涌动，到中曾根时代喊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再到小泽一郎提出“日本改造计划”，不难看出这一思潮的发展脉络。及至小泉上台后，这股新国家主义思潮不仅实现了空前的膨胀，而且正在部分地变为政策和行动。

“新思维”及“外交革命”论者试图通过改善中日关系来谋求我国最大利益的愿望可以理解，问题在于其主张的交友而又可能树敌的“战略集中原则”是否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在于其对日五点让步建议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可和来自日本的积极互动。

具体说来，新国家主义的文化本位主义，其深层基础与“神道”思想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关联，其现实特征则是鼓吹

日本文化的主体性、特殊性和优越性，不但要求他人承认日本文化的价值和标准，还希望他人学习并接受日本文化，反过来却轻视他国、他民族乃至世界通行的文化习惯及道德准则。例如，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自虐史观”、“自由史观”、“皇国史观”、“殖民地解放论”、日欧美“同罪论”等试图从各个角度否认、模糊或淡化日本在过去那场侵略战争中历史责任的谬论，便是这种文化本位主义的集中体现。

新国家主义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强调国家主权和行动自由权，并要求在国际上取得大国地位。其公开的理由是战后日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成为经济大国，为国际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要求国际社会准其“入常”而成为政治大国，同时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近年来，日本正在将这一思想付诸行动。在对外政策上，“强硬外交”开始取代战后以来基本奉行的和平、协调外交，抓住机会逐一突破国际社会禁区，并且不再像以往那样顾忌周边邻国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在对内政策上则跃跃欲试修改束缚其手脚的和平宪法。

日本战后 60 年的和平、民主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其国际地位的相应提高也不无可能。但是，日本迄今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缺乏诚意，言行不一。一些政客主张在外交上搞“强行突破”，以为日本只有敢说“不”才能激发国民的斗志，才能在国际上争得更高的地位，他们不懂得这种愚蠢做法只能招来世人的不信和反感，因为这种形象的日本越强大就越是让人不放心。

三、单方退让无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

中日间摩擦的加剧及民众互厌情绪的增长，确实在悄然地腐蚀着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对此，中国学者曾提出过对日外交“新思维”及“外交革命”的主张，结果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一场中日关系的大讨论。一时间，在日本好评如潮，在中国则是“和者盖寡”。

这场讨论现在似乎已到了该降下帷幕的时候了。对于中国学者这种洋溢着高度自我批评精神和大度而单方退让的建议，日本方面没有积极回应，有些人倒是以这些自我批评材料为口实，把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推向中国一方，在对华关系上态度更加强硬，逼迫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从而激起中国民众的更大反感，这也是最近国内反日情绪高涨的重要起因。

有人把中日恢复邦交后的十年称做“蜜月时代”。确实，当时的中国民众几乎已经“搁置了”中日两国间那段“不幸的历史”。然而自1982年发生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后，日本一再发生否认侵略历史的各类事件，中国民众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这是导致两国关系不顺的主因。而若探究日本为何坚持这种错误做法，答案也许可以从80年代后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中寻找，了解了这一点，或许也就解开了中国的退让何以不能换取日本妥协的谜团。

四、新型中日关系的本质及其必然性

迄今为止以友好、合作为基调的中日关系，今后仍应继续

保持下去，但客观上双方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竞争，这意味着中日间的交往将摆脱较多的感情因素而服从于理性的选择。

合作的本质源于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思想，也是我国为实现“和谐社会”的战略发展目标所必须执行的对外关系指针。在合作的概念中，还包含着和平、友好、开放、共存等多层涵义。总之，“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古训依然适用于今后的中日关系。

对日“合作”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它是个“搬不走”的近邻，近邻关系搞好了胜似远亲，搞不好则会被搅得心神不宁；其次，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具实力的发达国家，对中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及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不应低估两国既往的合作成果，同时对保持和加深这种合作也应抱有信心；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中华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我们现在不逞强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的特质，对外合作将是一个永久的选择。

“竞争”之所以成为新型中日关系的主题词之一，原因在于制约两国关系的客观环境正在发生逆转性变化，中日两国都应在心理上承受这种变化，学会在竞争中共存共荣的艺术。

“竞争”的概念中还包含着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两层涵义，良性竞争可以为社会发展带来动力，也会为竞争双方带来双赢的结果；而恶性竞争是以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为前提的，一旦处理不当，可能会发展为对抗乃至武力冲突，这是要极力避免的。对此，中日双方都应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清醒认识，引导竞争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五、改善中日关系的现实对策与途径

为了把中日关系引入合作与竞争的正常轨道，我们必须审慎地分析当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继续本着“求同存异”、“面向未来”的态度，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打破两国关系的僵局。

第一，扩大合作交流领域，以积极因素化减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尽管摩擦增多，但双边关系中的经济合作与民间交流基本正常，在区域及国际事务中也维持着多边合作关系。以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以多边合作促进双边合作的进展，仍然不失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基本途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下，中日两国经济、文化等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将使传统意义上非此即彼的利益关系变得模糊，而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形成将为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官方接触，拓宽政治对话渠道。尽管中日两国分歧很大，但毕竟与恢复邦交前的政治环境不同，两国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交换意见，处理纠纷。在目前的情况下，双方有必要建立更具权威的机构对应性地开展工作，协商处理有关纠纷并共同应对突发事件。

第三，在处理中日摩擦的具体问题时，既要讲原则，又要讲灵活性，要有理、有利、有节。例如，反对现职首相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就是个原则问题，不能让步。甲级战犯是远东国际法庭裁定的，不是中国强加的，反对参拜理由充分。钓鱼岛主权归属及东海划界问题也是原则问题，但在处理

方法上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对于我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及某些过激行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细致的工作，使之清楚怎样做才是合理合法的感情披露而不属于越轨；怎样做才能既打击了日本的右翼势力而又不伤及普通民众；怎样做才能既符合国家最大利益而又不损害我们的国际形象。

第四，强化媒体管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的形式、手段和传播速度非同以往，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则为大众传媒提供了更加广泛多彩的内容，要使具有双刃剑作用的媒体服务于中日关系的改善，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事实上，这种做法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照行不误，言论自由只是相对的。为了构筑新型、良好的中日关系，媒体的使命应该是向积极的方向引导而不是相反，应该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和识大体、顾大局、面向未来的态度，分析报道中日关系的各种事件。例如，在纪念反法西斯暨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特殊年份里，日本当年侵华暴行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内容将在各种媒体上展现，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主流媒体既要反映上述内容，也不应忽视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合作成果的宣传力度，因为适当地把握正反两方面内容的平衡，不仅体现了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而且也会给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广大民众带来鼓舞和信心，而使蓄意破坏中日关系的势力失去恶意中伤的借口。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日关系的前途充满荆棘，但是只要两国人民携手努力，必将迎来美好的明天。

读日本《应与美中两国合作》一文有感

朱庆余

2005年2月9日，日本神户大学五百旗头真教授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了题为《应与美中两国合作》的文章。文中指出：“日本趋向与中国对抗是极大的错误……如果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对中国等国家采取粗暴态度，就会给日本在亚洲地区的活动造成困难，并随时会招致被美中双方疏远的事态。”

这是非常理智而又清醒的判断。

就日本社会的传统思维而言，五百旗头真教授的见解，又是一种不同凡响的逆向思维。所以称作“逆向思维”，是由于五百旗头真教授冷静地意识到：近代日本“未能认同与日本一样也希望独立和发展的近邻国家的民族主义。相反地，日本却认为是对日本正当的既得权益的挑战。日本走上了战争之路，这是一条通过武力粉碎周边国家爱国之心的道路……结果使仇恨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仍挥之不去”。

战后60年的事实表明，是否具有这种“逆向思维”，也即是否具有通常所说的“反省”或“反思”，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同样是战前的法西斯国家，同样是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德国，却因战后的德国政府诚心实意地反省和道歉，表明了对侵略战争和种族大屠杀的深恶痛绝，从而赢得了被害国家的信任和谅解。战后德国政府的态度是，绝不回避而

且敢于面对历史，并且教育德国子孙后代永远牢记战前法西斯的罪行。这与现今的日本政府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

对此，人们注意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作用。其人数不多，能量不小，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身居要职。然而，归根结底是战后以来多数的日本内阁成员和政治家，还没有这种“逆向思维”，不肯进行认真而彻底的“反省”或“反思”。因此，不仅“失言大臣”连续不断，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合格”的中学教科书，也依然严重歪曲和掩盖战前日本的侵略历史，实可谓“我行我素”。这种态度、这种行为，怎能得到亚洲被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谅解？

在近代以来的日本对外关系史上，并不是中国、朝鲜和亚洲国家威胁了日本，而是日本政府基于明治初年“大力充实兵备，布国威于海外”的国策方针，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侵略扩张。

如1876年，日本政府迫使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便含有日本可以随意测量朝鲜沿海岛屿、海湾、绘制图志的特权。其名义是所谓“避免危险”^①。

1890年3月，当时作为日本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论略》中写道：“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大凡为国，不可没有主权线，也不可没有利益线，而外交及兵备之要诀，则专以此两线为基础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际，要维持国家之独立，仅是守卫主权线业已不足矣，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于有利之地位。而如何保护利益

线呢，即各国之所为，苟有对我不利时，我当有责任加以排除，不得已时，则以强力达到我国意志。”^②

这种“保护利益线”的政策，特别是把拥有独立主权的朝鲜，作为需要日本政府“保护”的所在，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邻国关系上说，都不是什么“自卫之道”，而是侵略之道。

1894年，日本政府又迫使朝鲜承认“将来有关巩固朝鲜国独立自主之事宜，当由两国政府派员会同协商议定”^③等等。

1904年2月23日，日本政府进一步通过驻朝公使林权助，与朝鲜兼理外部大臣李址谿缔结所谓《日韩议定书》，其核心内容是：迫使朝鲜政府“确实相信大日本帝国政府，并采纳其有关改善施政的忠告”（第一条）；“大日本帝国政府确实保证大韩帝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第三条）；以及所谓“由于第三国的侵害或内乱，大韩帝国皇室的安宁或领土完整处于危险时，大日本帝国政府可迅速采取临机必要措施”，“为了达到前项目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可临机收用军事战略上的必要地点”（第四条）等等，^④加速蚕食朝鲜的国家主权。

时至1910年，日本政府则公然“合并韩国”，变朝鲜为日本的殖民地。

同样，对中国也是如此。具有典型意义的，则是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征讨清国策案》，其中明确提出：“欲维护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然立于万国之间，以保持安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不可不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

日本要维持国家独立，这无可非议。但是，企图把本国的独立建立在攻击乃至分割邻近国家之上，则全然是战争政策和